

未名译库·学术译丛

魏常海 诸葛蔚东 主编

成熟的江戸

[日] 吉田伸之 著
熊远报 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译库·学术译丛

魏常海 诸葛蔚东 主编

成熟的江戸

Chengshu De Jianghu

[日] 吉田伸之 著

熊远报 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11-277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熟的江户/(日)吉田伸之著;熊远报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5

(未名译库·学术译丛)

ISBN 978-7-301-18281-9

I. ①成… II. ①吉… ②熊… III. ①社会发展史-日本-中世纪
IV. ①K31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9238号

书 名:成熟的江户

著作责任者:[日]吉田伸之 著 熊远报等 译

责任编辑:魏冬峰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281-9/C·063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weidf02@sina.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6.75印张 239千字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3.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本书的出版得到
日本三得利文化财团
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18 世纪 由通史到整体史 / 1

- 1 通史和整体史 / 1
- 2 18 世纪的政治过程 / 5
- 3 秩序结构——统治层身份 / 15
- 4 秩序结构——民间社会 / 21

第二章 社会性权力——豪商与町 / 28

- 1 何谓“社会性权力”? / 28
- 2 超级大商店——三井越后屋 / 33
- 3 町与大商店——京都冷泉町 / 60

第三章 身份性边缘——劝进与艺能 / 90

- 1 构成近世社会的“身份性边缘” / 90
- 2 愿人僧人——是僧侣还是乞丐? / 98
- 3 乞胸——特异的艺能人集团 / 127

第四章 汇聚于市场的人群 / 155

- 1 商人与市场社会 / 155
- 2 蔬菜市场和甘薯 / 161
- 3 探索鱼市内部 / 188

第五章 江户的小宇宙 / 218

- 1 广场与境内 / 218
- 2 18 世纪社会的成就以及历史的“最深远宇宙图像” / 231

年表 / 245

参考文献 / 257

译后记 熊远报 / 258

第一章

18 世纪 由通史到整体史

1 通史和整体史

描绘“成熟”——通史是什么？

以 18 世纪为中心，描绘“成熟的江户”是《日本历史》这套丛书交给本书的任务。这里所谓的“江户”，主要是指近世、尤其是江户时代，同时也指曾是德川幕藩体制下首都的巨大城下町江户（现在的东京）。

横田冬彦为《日本历史》丛书撰写的第 16 卷《天下泰平》主要聚焦于 17 世纪，以政治状况为中心轴，从不同侧面讨论了日本近世社会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我在本卷中，将以横田冬彦辛勤探索的成果为出发点，以江户为中心，从社会史—整体史的视角来具体地考察确立后的日本近世社会，在江户时代究竟是以怎样的内容结构走向“成熟”的？而且我将限定具体的研究素材，对一个一个问题尽量展开详细、精致的描述。

在《日本历史》这套丛书的发刊词中,主编就丛书的特色作了几点说明,其第一即本丛书的定位是“困惑时代的探求——21世纪最初的日本通史”。但是,所谓通史,原本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呢?比如20世纪末,由岩波书店出版的25卷本《日本通史》,给主要部分的21卷的各卷卷头都配有一个“通史”内容,其目的在于“以包含对外关系的政治经济过程为中心,进行通史式的叙述,描出那一时代的历史面貌”。如果仔细分析其中配给日本近世社会的五卷,可知其将17—19世纪的各世纪分为两半,每一卷叙述的是半个世纪的通史。以国家层面的政治史为中心、兼顾对外关系史、在背景上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这种内容配置形式实际上成了所谓通史的标准叙述方法。

但是,通史为什么必须要以国家的政治史为中心呢?描绘某一时代的历史面貌时,难道只有上述意义上的政治史才是最为有效的吗?如果暂且将上述看法视为不易之论的话,那像我这种主要以城市社会史为专业方向的研究者,叙述通史就变得极为困难了。通史是什么?通史究竟应该如何叙述呢?另外,历史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作通史叙述吗?实际上有关这一点,我觉得学术界迄今并没有作深入思考。因此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混乱的时代”里,必要的不是多次反复撰写的、异曲同工的政治史式通史,而是社会的整体史。

整体史与社会性结合

前述的这种我对通史形态的疑问,实际上是与法国的社会史研究中,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所进行的、亦即对所谓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实证主义是指专以仅仅确认文书史料中记载的史实为目标的历史认识方法。二宫宏之列举了实证主义史学批判中强调的三个方面:① 实证主义史学将一个孤立的史实视为毫无相互关联、孤零零的存在。② 在实证主义史学学者那里,那些容易以文书形式留存下来的、在历史表层显现的事件受到注目,历史流于事件史——具体地由政治史、外交史——等构成。③ 在实证主义史学学者那里,一个个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被按照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来解说,历史化为一种记载、叙

述先后相继出现的诸事实的“编年志”(二宫宏之《观照整体的眼睛和历史学家们》)。1929 年创刊的《社会经济史年报》(年鉴学派)为了克服实证主义的这种弊端,将“活着的历史学”作为基本理念,强调恢复人的“整体性”的“整体史”才是历史学应该追求的方向。

我觉得实证主义史学的上述三个特征也是我们现在所谓通史很容易犯的弊端。据二宫宏之介绍,近年来,法国历史学追求的“整体史”,是以“从历史的‘深层’出发,将包含着历史表层的、多样的人们活动的总体”作为一个“重层性多元性”结构的“整体”来理解的,这一点是整体史的研究目的。这里所说的“深层”是指人们的“心灵”(心性)和“身体”,深层—表层的复杂关系在这里暂且不作详细讨论,要把握整体史、亦即把握重层性多元性的历史社会结构的整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且,二宫宏之自身也以法国绝对王权时期的统治结构为中心,具体地描述了不断受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而又适应这一结构的权力秩序以及构成权力秩序基础的社会性结合关系(sociability)的状态,展示了整体史研究方法的一个侧面。

整体史和“重层与复合”论

在描述以 18 世纪为中心的近世社会特质的本书中,我特别自己能吸收上述法国史研究中有关社会性结合的成果,但本书并不是迄今为止屡次被同样以所谓政治、外交为中心展开叙述的“通史”写作的重复,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从社会结构整体的深处把握历史整体状况的整体史研究的尝试。

在这一目标下,应该重视作为其前提的社会分析方法,有关这一点,我想特别提及塚田孝的“重层与复合”理论。这一理论是塚田孝基于日本近世贱民制度的研究提出的,亦即社会结构分析的方法论(塚田孝《社会集团研究》,收入《近史日本身份制度研究》)。塚田孝指出:近世社会是由社会集团(共同组织)的重层复合的交织状态而形成的整体社会。这里的社会集团是指构成近世社会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身份集团。以武士

的“家”为首，普通村民的“村”、市镇居民的“町”（街道）、职人^①的共同体组织，贱民的共同体组织等等都是这些社会身份集团的基础性内容。

塚田所谓的“重层”是指“复数的村落组合成规模较大的复合村，复数的町^②联结成复合町，这样的基础性社会集团不断地形成从属的、派生的集团关系”。亦即具有相同性格特征的社会集团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所谓“复合”是指“不同性质的社会集团间的交流与联系”。比如，市镇居民（町人）与下贱的非人^③，町人与座头^④之间的关系等等，即指不同性质的社会集团间的关系。近世社会可以说是从统治者到贱民，范围极为广泛的、而且是在很多社会集团间交织盘结的无数相互关系结构中形成的整体社会。

正是“重层与复合”论的分析方法，为我们详细而精致地描绘近世社会的实际状态、准确地理解当时社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且它同时也向我们揭示无论分析某一个别性事例，还是把握社会的整体状况，看上去并不相干的现象间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社会性权力与分节结构

笔者认为以塚田的方法论为基础，进而不仅仅将历史社会作为社会集团的复杂关系结构来考虑，而且应该在那里发现固有的秩序结构也是十分重要的。所谓秩序结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表现，有如具有多样个性的铁粉，因几块放在近处的磁石的吸引，而吸附在磁石上，形成各自特定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把一粒粒的铁粉比作一个个社会集团，进而把统治者等等比作磁石。这样来看的话，近世社会相当于以统治权力为中心的磁力所及的范围，亦即磁场。在那里，领主权力与被统治身份者团体间的关系构成社会的骨骼，因此而形成的结构我们称为权力秩序。

但是，近世社会的磁场并非是由封建领主和人民这一二元结构组成的单纯的社会秩序。特别成问题的是在被统治者内部，我们也能发现一

① 职人指工匠。

② 町指市镇。

③ 非人为江户时代最底层的贱民，主要从事押送犯人和葬埋罪犯尸体等工作。

④ 座头为以说唱、按摩等为业的剃度盲人。

些边缘的社会集团以及大小不同的将人们联成一团或束缚人们的磁场。比如基层社会中的“豪农”^①、都市社会中的大商店主等就类似于上述情况。具体地考察他们的磁场的状况是本书最初的任务。但我想在这里暂且一概将其称之为“社会性权力”(有关社会性权力的内涵将在第二章第1节中详述)。不同于领主等权力,社会性权力构成一个磁极,我们将由此而形成的秩序状况称为“分节结构”(有关分节结构的内涵将在第五章第2节中详述)。

2 18世纪的政治过程

由赤穗事件到伊能忠敬

将以上所述作为方法上的前提,在本书中,尽管还只是一部分,但我想尝试描述的是18世纪的日本整体史。在进入正式描述之前,我想先将“18世纪”的定位以及被称为幕藩体制的近世社会秩序结构的概略作一个简单的素描。

首先请看本书末尾的年表,如果从主要话题上来观察18世纪日本的话,那可以说是由赤穗事件到伊能忠敬的100年。

1701年是元禄十四年。这一年的3月14日上午九点左右,在江户城的松之廊下,发生了赤穗藩主浅野长矩(34岁)将幕府权臣高家^②吉良义央(61岁)砍伤,自己也于当天切腹自杀,浅野家所领有的53000石领地被幕府没收的大事件。但这一事件并没因此而结束,浅野长矩死后丢下的藩士中的46人,在浅野藩的首席重臣家老^③大石良雄的领导下,于翌年12月,袭击了在本所松坂町的吉良家的邸宅,杀死吉良义央,为被迫切腹自杀的主君浅野长矩报了仇,这一群武士实际上以为主君殉死的方式而死。作为显示江户时代武士伦理意识的典型事件,这一群武士的行为被

① 豪农为农村社会中强有力的地主。

② 高家系江户时代为数不多的名门,负责幕府典礼仪式。

③ 家老为大名的重臣,统率藩主的武士,掌管藩主的内务。

认为是给封建社会添彩的忠君“美谈”。通过18世纪中期创作的净琉璃^①作品《假名手本忠臣藏》等媒介,这一事件起到了更加强化、甚至接连覆盖全体平民百姓的、所谓“喜欢武士的日本人”这一社会共识的作用。

另外,在18世纪的最后一年,1800年(宽政十二年)闰4月19日,虽然身居下总佐原的普通百姓身份,但又是大商人和学者的伊能忠敬(56岁)为了测量南从奥州道中,北至虾夷的广大地方^②,自江户出发,开始了日本全国沿岸地域的测量工作。众所周知,他制作的地图采用了科学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成为非常精致的经典之作。直至1880年代陆军主导的“迅速测制地图”为止,他的地图被作为描绘日本列岛最好的地图而广泛利用。

武士为主君复仇殉死的封建道德,和基于近代的合理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地图测量,我觉得在时隔100年的这两个插曲中,明确地显示了终于被西洋世界强行拉入近代社会的18世纪的日本社会自身的变化程度、这一社会的两面性以及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变动。

沉静的国际局势

与18世纪日本有关的东亚国际局势,如果同以前、以后的世纪相比,显得十分沉静和安定。17世纪是在面临收拾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残局、对应动荡的东亚局势的同时,尽管被扯入已经开端的全球规模的世界史体系中、却又不断强化日本内向“锁国”政策的过程。不过,在17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延续的所谓“华夷变态”(中华—明朝的灭亡,蛮夷—清朝征服中原)的最终阶段,曾经与清朝协作的汉人军团大规模叛乱(三藩之乱)在1681年(康熙二十年、天和元年)被平定后,东亚的国际形势为之一变,转而沉静下去。接着,清朝停止执行海上贸易封锁政策(迁海令),开始积极推进海外贸易政策(展海令)。全面推行锁国体制的日本与清朝之间虽无正式的国交关系,但因清朝的积极贸易政策,很多中国船(唐船)满载着生丝、药材来到长崎,以换取日本的金银等物,展开了非常活跃

① 净琉璃为日本的传统说唱艺术。

② 虾夷地方在这里主要指今北海道地方。

的国际交易活动。

另外,西欧各国,特别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尖兵的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等杀进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中,他们与亚洲各国和地区继续开展贸易活动,但这种贸易基本上还停留在工业革命以前的重商主义活动范围之内。俄罗斯同中国自 1689 年缔结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两国国境后,双方关系进入比较安定的时期。荒野典泰氏在讨论当时的这种国际关系态势时指出:“将与在北方的俄罗斯和在南方的西欧诸国的关系放在外侧,在清朝巨大的华夷秩序中,内含着各自展开的,交错不清的日本—朝鲜的华夷秩序等的多重复杂关系,这一复杂的多重国际关系框架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在这一背景中,作为幕府直辖的唯一的贸易系统,通过长崎形成的日本与荷兰、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由 1715 年(正德五年)颁布的“正德新例”(《长崎海舶互市新例》)奠定了基本框架。这种关系直至 18 世纪以后的“外压”到来之前一直被保持下来。当时的这种日本与外国贸易关系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了限制激增的中国货船而导致金银货币过度流出国外,幕府以 1685 年(贞享二年)颁布的《御定高仕法》(将日本与荷兰、中国的贸易额限定在每年银 9400 贯内)为基准^①,维持与外国的贸易关系。这一办法将铜出口的上限定在中国船 300 万斤,荷兰船 150 万斤,超过了这一上限的部分,由水产品等各种实物来支付抵消。第二,就贸易船的数量而言,容许 30 只中国、2 只荷兰船航海来日。其中对于中国船,幕府以通事的姓名发给信牌进行管理^②,使其遵守贸易规定。通过这一方式,幕府确立了“锁国”背景下以长崎为窗口的、长期而且稳定的海外贸易体系。

此外,“锁国”体制下的幕府还和朝鲜、琉球、虾夷地方的阿伊努人结成了国际关系。与朝鲜的关系,以对马藩主同朝鲜国王间的进贡贸易为核心,通过对马和长崎这两个窗口展开。琉球被置于萨摩藩的控制之

① 一贯约为 3750 克。

② 通事即翻译。

下^①，在这种状况下，对中国的朝贡贸易、向萨摩藩提供黑糖和姜黄^②成为琉球与外部贸易的主要内容。另外，在虾夷地方，松前藩^③垄断了与阿伊努人进行贸易的权利，松前藩在捕捞作肥料原料用的青鱼、出口用的袋装海产品等渔业生产方面，开始向残酷奴役阿伊努人的体制转变，其间已有本州岛内的大商人资本参与这一过程等等，在这里其实已经呈现出幕藩体制进行类似殖民统治的种种特点。

18 世纪的中央政治史——德川家宣、德川家继时期

在前述的东亚国际关系环境中，如果从德川幕府将军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 18 世纪日本的中央政治史是从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80—1709 年在位）的末期，经过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1709—1712 年在位）、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1713—1716 年在位）、享保改革时期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716—1745 年在位），进而经过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1745—1760 年在位）、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1760—1786 年在位），到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1787—1837 年在位）初期——宽政改革期，是前后长达七代的治世时期。由上面的叙述可知，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基本上处于稳定—停滞性状态，对外的危机意识并不存在等等，政治处于内向性发展，政治史方面，内政部分约占其大半。下面，以幕府将军的治世期间为基准，我简单地概述一下当时政治史上的主要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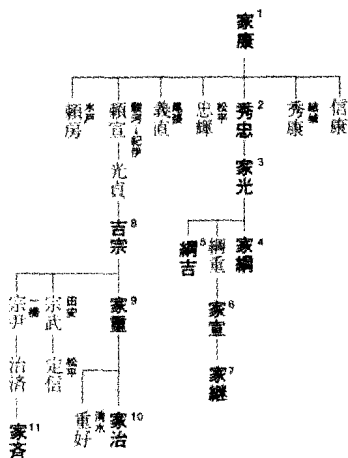
在 18 世纪的开头，即德川纲吉政权的末期，几乎难以发现很突出的话题。1707 年（宝永四年）11 月，富士山这座活火山大规模喷发，对因火山灰受巨大损害的地域，1708 年闰 1 月，幕府下令全国无论其为幕府领地，还是大名领地，每百石单位，上交国役金二两，以充灾害复旧费用。当时也就只有这样一件事稍稍引人注意。

1709 年，长达 30 年的德川纲吉政权终于迎来了末期，以旧甲府藩主的身份成为德川纲吉养子的德川家宣在 47 岁时，做了第六代幕府将军。

① 萨摩藩是位于今鹿儿岛西部的诸侯国。

② 姜黄是一种亚洲热带草本植物，根径可作香料和药材。

③ 松前藩主要指位于北海道渡岛半岛西南部、以城下町松前为中心的诸侯国。



【德川将军家系图】

(粗体字为将军,数字为代数)

德川家宣视身边的佣人间部詮房、侍讲新井白石为心腹,他继承了德川纲吉政权以来以谱代大名^①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极为迅速地实施了下列改革:废除动物保护条令,整顿幕府领地的代官^②,改铸货币(正德金银),新设闲院宫家^③,改定朝鲜通信使国书上的“日本国王”称号,实施长崎贸易中的正德新例等等。这些改革被称为“正德之治”。1712年德川家宣去世后,间部詮房、新井白石在短期内辅佐年幼将军德川家继,但因将军7岁多即死去,改革并没取得什么大的进展就遭遇了挫折。

德川吉宗政权期——享保改革

德川家继之死意味着德川秀忠血统的断绝。接下来,从最初的德川氏三家之一的纪州藩德川家迎来了新将军。新将军即为德川吉宗。德川吉宗(頼方)是德川家康的曾孙,1705年(宝永二年)成为第五代纪州藩主以来,正在推行以重建财政秩序为核心的藩政改革。也就是说德川吉宗

① 谱代大名为江户时代大名的一种级别,多为关原之战前的德川氏的臣子,以及与此相同级别的大名。

② 代官为主要负责幕府领地的赋税征收和民政事务的官僚。

③ 闲院宫家系天皇家的四亲王之一,由新井白石建议设立,始于东山天皇的皇子直仁。

带着藩政改革的经验坐上了江户城幕府政治中枢的位子。

德川吉宗的政治改革,首先在大名^①、旗本^②中,特别重用谱代^③一门阀^④,提拔从纪州藩带来的旧家臣为幕府重臣,以这些人作为其政权的权力基础。其次实施的不是老中^⑤合议制,而是将新设的御用取次和旧有的三奉行(寺社、町、勘定)^⑥放在权力中枢,让这些机构和官僚具有实权。另外,从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角度,任命水野忠之为胜手挂老中(管理财政和民政)、大冈忠相为町奉行、神尾春央为勘定奉行,对任命的人才采取优遇措施,用足高制(对收入没有达到所任职务工资标准的官员,在其担任实职期间,补足其不足的收入部分的制度)保证官员任职期间的家格门第等。为了推进财政和民政上的改革政策,大幅扩充了勘定所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培养了不少被称为“地方诸葛亮”的管理人才。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大大地充实和增强了中央统治机构的职能。此外,德川吉宗从强化自身血统这一立场出发,新给世子家重之弟宗武设“田安家”,给自己的小弟弟宗尹设“一桥家”,让他们具有宗家继承权。这与其后德川家重让次子重好设立的“清水家”合在一起共为三家,德川吉宗直系的“御三卿”就是这样出来的。

德川吉宗的政治——成为享保改革骨骼的是年贡增收政策、通货政策,以及城市—农村政策。在幕府实施的年贡增收政策中,有如下重点:第一,在以山林、田野、河海为对象的新垦田地开发过程中,积极利用实力雄厚的商人们的资金。由此而开发出来的新田地纳入幕府领地中,这

① 大名系江户时代领地在—万石以上的诸侯。

② 旗本为江户时代将军直属的家臣中,报酬不满—万石、具有御目见以上资格即能够参见德川将军的武士。

③ 谱代即代代供职于领主家的世臣。

④ 门阀指幕府时代门第较高的家族。

⑤ 老中为江户时代的幕府官职,直属将军,总理幕府政治,管理朝廷、大名事务,直接统辖边远藩国的官吏。担任老中一职的有四至五人。

⑥ 寺社奉行是江户时代管理有关寺社的人事、杂务、诉讼等事务的行政官员。町奉行是江户时代负责管理江户、京都、大阪等城市的行政、司法、警察等事务的行政官员,这里主要是指负责管辖城市事务、听断居民诉讼的江户奉行。勘定奉行是江户时代的幕府官职,其职责为监督幕府直辖地的管理官,负责处理税收、金钱支出等的幕府财政事务,以及领地内有关农民的行政、诉讼等事务。

一政策实施的结果,到1722年,约为410万石的幕府领地额增加了50万石,亦即幕府领地增加了12.2%。第二,在交纳赋税方面,对全国的幕府领地实施定免法(在一定年限中,实施定额年贡率的赋课方法),另外,对畿内等地方随着商品作物的生产而增加剩余产品的村落,推行三分之一交纳现金的方法(让其用银交纳三分之一年贡的方法),借此实现各种年贡赋税的增收。改革之初,幕府年贡赋税收入约为130万石至140万石,享保中期以后,年贡赋税收入量达到160万石至180万石,实现了相当数量的增收。

在通货政策方面,德川吉宗试图彻底解决为获取余利而粗制滥造的元禄金银货币品质低劣,以及因乾字金^①、正德金银的挫折等原因而混乱的货币体系问题,继承了正德时期的货币政策,对货币政策进行了根本性调整。铸币改革收到了实效,使货币恢复到了庆长时期金银货币品位同质同量的水平,这一通货政策就是1716年(享保元年)以后,以铸造享保金银货币为中心的优质货币政策。但是,这种政策难以满足社会上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1736年(元文元年),幕府实际上不得不再次回到铸造劣质货币政策的原点上,由此而铸造的低品质的金银货币(文字金币、文字银币)以后就长期固定下来了。

幕府的城市—农村政策具有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重要内容。这些政策包括:第一,对以江户为中心的城市行政进行改革。1719年幕府发布“相对济令”(有关金钱借贷纠纷让其在当事者之间解决,借以抑制诉讼件数增多的政策,1729年废止),在1720年,幕府设置街道防火协会,在1721年,幕府下达组织商人—职人协会命令,1722年,幕府创设支配名主交替制,同年,幕府设立小石川养生所,同一年,幕府对街道住民的“足役”^②采取了以银代纳的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当时城市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原本是为了更加合理、有效地对膨胀起来的巨大城市的社会和经济活动进行统治和管理,也是为了构筑城市的防御灾害体制,试图导入一部分封建性社会政策。但同时容

① 乾字金是1710年幕府制造的一种小额硬币,因铸有“乾”字而得名。

② 足役系江户时代徭役的一种。

认了城市内的商人—职人协会以及同业组织。这些政策可以说显示了幕府事实上默然居于市场社会核心的市场同业组织以及巨大商店等势力雄厚的商人阶层作为城市内部的社会性权力的存在。

第二,实施以抵押土地为中心的农村政策。1722年4月,幕府发布的“质流地禁止令”和1723年8月取消“质流地禁止令”都具有象征性意义。“质流地禁止令”是针对17世纪末以来快速扩张的强势地主阶层兼并普通农民的抵押土地而实施的抑制性政策。但是,以禁止抵押典当土地流入债主的“质流地禁止令”的发布为契机,在越后颈城郡和出羽村山郡,发生了因耕地被剥夺的小农强烈要求赎回抵押土地的暴力骚乱,幕府对要求赎回抵押土地的骚乱事件十分震惊,不得不改变政策,转而取消了“质流地禁止令”。幕府由此转为拥护抵押地主(债主)的权利。正是如此,幕府权力开始依存抵押地主/村落的底层官吏等有力的地方统治力量,公认地方社会中社会性权力的存在,大幅调整了农村政策。

德川家重、德川家治时期(宝历至天明)和田沼政治

德川吉宗于1745年(延享二年)辞去将军职务,到1751年(宝历元年)他去世为止的数年间,在幕后监护由西丸的大御所^①当上第九代幕府将军的德川家重(当时35岁)。德川家重因身体病弱,于1760年将幕府将军一职让位给长子德川家治(当时24岁)。弱势的第九代、第十代幕府将军政治主导权的发挥远远不及德川吉宗。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央政治史,以补充软弱的幕府将军权力的形式,君临幕府政治核心的田沼意次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田沼意次的父亲田沼意行是伴随德川吉宗来江户的纪州藩的下级旗本,但是与德川家重成为幕府将军的同时,田沼意次的政治地位获得超乎寻常的快速提升,1750年代,他担任“侧用申次”这一幕府将军身边的重要职务,同时他也由高级旗本逐渐逼近大名这一当时社会身份的顶点。田沼意次则在德川家治政权时期更加受到重用,1767年担任“侧用人”职

^① 御所多指天皇、皇子、亲王、将军、大臣的住所。